

杜公祠

◎国宝档案

“南渡春流浅，西风片雨晴”。这是唐人韩翃描写樊川的诗句，浅浅蜿蜒的水流，时断时续的细雨，简直美得不可方物。此地两原相峙，背靠少陵，南望神禾，东是杜曲，西是韦曲。周为樊邑，汉为樊侯的封地，唐时韦杜两大家族在此聚居。曲的原意是蜿蜒的溪水，水润樊川，便有了十里桃花百亩稻田，有了梵音袅袅八大古寺，这一片山水林泽就成了盛唐的遗韵。

余光中说，李白酒入豪肠，三分啸成了剑气，七分酿成了月光，秀口一张便是半个盛唐。在笔者看来，樊川这一片山水田园，却属于另一个诗人，那就是杜甫。杜甫在长安十年，其中有两年住在少陵原畔的牛头寺旁，他在长安朝扣暮随的清苦生活，却展现了盛唐的另一幅景象。

宁静中印证着孤寂与无奈

有人考证，杜甫的远祖是晋代杜预，祖籍也在樊川。他的祖父杜审言在洛阳一带做官，杜甫出生在巩县，青少年时代一直生活在河南。壮年之后，他来到长安，求取功名，想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，却屡屡碰壁，过着“残杯与冷炙，到处潜悲辛”的生活。凝视他走过的孑然身影，长安十年，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孤独的时光。也许是后人为了从感情上弥

补，千年之后，在少陵原畔建了一座祠堂，让他享受香火的供奉。

杜甫的祠堂不大，青砖灰瓦，掩映在青松翠柏之间，与成都的草堂有天渊之别。成都的草堂规模宏大，终日人声喧哗，这里宁静而少有人来，恰恰也印证了诗人困顿长安的孤寂与无奈。

杜公祠依少陵原而建，北依少陵原，南望神禾原，西接千年古刹牛头寺，下坪是一座将军的陵园。拾阶而上，走过一个小小的山门，便是一个寂静的小院。正面坐北朝南有享殿三间，正中有杜甫的塑像一尊，神态肃穆，郁郁端庄。塑像东侧是“唐杜文贞公遗像”碑，碑上有诗人着朝服的半身石刻像。享殿西碑房墙上嵌着古碑六通，除《守护法藏诫文》碑外，其余皆是明清两代修祠的记事碑。山门两侧建有碑廊，是历代书家书写杜诗的碑林，曲曲折折、蔚为大观。东西的展室展现了杜甫的生平，特别是在长安十年的经历，观看之后，让人思绪万千。

“美花多映竹，好鸟不归山”，这是他初来长安，赞美韦杜地区的诗句，然而这时却有山不能归，有家不能回。兵荒马乱，他只能四处漂泊，从奉先县到鄜州、到灵武、到凤翔……

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

杜甫初到长安是天宝五年（公元746年），是唐明



皇纳寿王妃的第二年，权臣李林甫红极一时的时候。杜甫时年三十五岁，正当盛年。他雄心满满，从中州大地走来，从齐鲁孔孟之乡走来，从吴越会稽走来，从江淮太湖走来，壮游了四方，觉得已有足够的才华，然后来到喧嚣的都城，追宗思源，祭拜远祖，求取功名，以实现经国济世、安邦定国的宏伟理想。

“赋料扬雄敌，诗看子建亲”。杜甫对自己相当自信，认为他的才华与汉朝扬子云（扬雄，字子云）、三国曹子建不相上下，而且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，简直是天下奇才，比他的偶像李白刚进长安时还要自负。然而，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，在李林甫“野无遗贤”的禀奏下，他科举考试又一次名落孙山。这让他乱了阵脚，以致穷困潦倒，到了三餐不保的地步。“饥卧动即向一旬，敝裘何啻联百结”，在穷困和失意的双重煎熬下，一个爬树健如牛的青年，被现实折磨成了

小老头。被逼无奈，一向铁骨铮铮的他不得不违心地求助权贵举荐，说一些肉麻的话，写一些肉麻的诗，还给唐明皇上了一篇拍马屁的《三大礼赋》。但，除了得到一个“端正贤良”的赞誉外，杜甫并没有得到一官半职，四年后才被授予一个管理兵械库的甲胄参军小官，这和他的理想和抱负相差甚远！不久，他便去职回家了。

“野无遗贤”——上升的通道已经被堵死，杜甫在长安毫无希望。在友人的帮助下，穷困的杜甫住到了少陵原畔牛头寺东跨院，自号“杜陵野老”，过起了“朝扣富儿门，暮随肥马尘”的生活。但看人脸色的日子毕竟不是长久之计，生活仍不安稳，因此杜甫把妻儿老小安顿到了奉先县，过着靠亲友接济的生活。杜甫自己仍然生活在长安等待机会……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，在他回到奉先县得知自己小儿子饿死时，他非常痛苦，作为一个父亲，他觉得自

己太失败，但也毫无办法。“长安苦寒谁独悲，杜陵野老骨欲折”。这还是人过的生活吗？

最美好的年华留在了长安

“穷年忧黎元，叹息肠内热”。他心太热，因而命也就太苦。他时时都抱着入仕的希望，想为民请命，振兴国家，但每一次都令他失望。他向往着燕昭王的黄金台，招贤任能，一血国耻，但只能是“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泣下”。

当听到太子在灵武登基的消息，他觉得机会来了，远走灵武，可半途被贼兵所执，抓回了长安。杜甫虽被困在长安，但心系朝廷，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战事的变化，在此期间他写了两篇文章：《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》和《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》，为剿灭叛军献策，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。当听说郭子仪大败叛军，肃宗朝廷迁到了凤翔府。于是，杜甫在一个和尚的帮助下，冒险从长安金光门逃出，穿过两军对峙之处，到凤翔见到了日夜想念的皇上。然而，刚登帝位的皇上却不怎么待见他，看他衣衫褴褛、忠心犹在，便授予他一个左拾遗的官职。左拾遗属于谏官，虽然只是从八品，官不大，但说话还有一定的分量。杜甫心太直，因而命运多舛，他确实不是官场中人，没过几天就卷入宰相房琯案中。房琯率军抗击叛军，

大败而回，被贬去了相位，当满朝文武无人为房琯说话时，只有杜甫一而再、再而三地为房琯辩护，最终惹恼了肃宗，要将他下狱治罪。好在有宰相张镐等人的搭救，杜甫才被无罪释放。但经此一遭，他也失去了皇帝的信任，被罢官回家。

杜甫是历史的失落者，他的诗直到一百多年后的晚唐才被重视。但诗只是一种文化现象，关于他的人，说的却不多。他的祠更晚一些，明嘉靖五年（公元1526年），长安人张治道经过考证认为杜甫的生里、流寓、宦乡都在长安，于是倡导修建了少陵原畔的杜公祠。但说起生里，长安只是远祖之籍；宦乡，只是个两天半的小官，却烦劳了诗人一生；最后只剩下流寓，流得万分凄苦，一生惆怅。从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，杜甫把一生最美好的年华都留在了长安，困守长安近十年，他期待过，努力过，挣扎过，甚至拉下脸皮，给人溜须拍马，希望能对朝廷有所贡献，最后却一事无成。之后四年便是安史之乱，他逃亡、被抓，短暂为官，在仕途和正义之间他选择了犯颜直谏，结果失去了政治前途。身未老，鬓已斑，他满怀希望而来，最后带着失望而去。

乾元二年，公元759年，杜甫丢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官职，前往秦州。之后漂泊西南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
（据《西安晚报》）

名字起得好

名次能提高

隋文帝开创科举制度后，科考取士逐渐成了历朝历代官员选拔的主要方式。然而，谁能想到，士子中与不中、名次的先后，并不全凭学业成绩，考生的姓名有时也会起作用。

唐佚名《玉泉子》载：会昌三年（843年），王起任主考官，考试结束后，他请示宰相、《次柳氏旧闻》作者李德裕，李德裕说，我没有什么要求，“如卢肇、丁棱、姚鹄。岂可不与及第邪？”结果，状元、榜眼、探花就按李德裕所

点三人顺序出炉。李德裕实在牛，状元、榜眼、探花一起搞掂。

五代王定保《唐摭言》卷八载：江东有个名叫包谊的士子，得罪了中书舍人刘太真，便被这个专门给皇帝起草文件的人牢牢“惦记”。“……明年太真主文，志在致其永弃，故落杂文……”此科放榜前，主考官刘太真照例带着录取名单呈送宰相审定，“宰相以朱批近大逆，未欲以此姓及第，亟遣易之。”刘太真惊愕万分，又不记得其他

后，才知眼前的状元乃寒门出身。

自唐至清，因姓名关系被天上掉下来的“馅饼”砸中的考生层出不穷。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，科举制度已成强弩之末，经袁世凯等人奏请，清廷已同意部分停止科考。这一年，将补行辛丑（1901年）万寿恩科和壬寅（1902年）正科会试合并举行。刚好，这年也有乡试，次年就是慈禧的七十大寿，主持乡、会、殿试的官员，都非常留意“吉庆之兆”。

头两批放到云贵两广主考官员的名字分别是：李哲明、刘彭年、张星吉、吴庆坻、达寿、景方昶、钱能训、骆成骥，连缀起来，就成了“明年吉庆，寿景能成”。这年殿试，必须取一个名字中有“寿”的士子，以示预祝，于是山东人王寿彭的名字很幸运地做了金殿传胪第一声。

古代科考有颜标、王寿彭等因姓名走“狗屎运”的，就有因名大受其害的“倒霉蛋”。顺治十二年（1655年）科考，初定太仓

人王揆为状元，可唱名时，顺治帝因读音相同想起《王魁负桂英》这个流传极广的剧本。剧中的王魁是个负心汉，中状元后抛弃糟糠妻。顺治帝脱口说：“是负心的王魁耶？”皇帝金口玉言，王揆的状元立马换成他人。同治七年（1868年）科考，拟定江苏人王国钧为一甲，可把“王国钧”连起来读，就是“亡国君”的谐音。慈禧太后听到这个名字，非常生气，结果王国就被拿掉了。

（据《北京青年报》）